

名家对谈

在文学中不断进行原初的追问

宁肯 王德领

“我的散文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,或更直接地说,西藏决定了我跳跃式的写作”

王德领:从20世纪80年代你就重视探索、实验。继“朦胧诗”后,“先锋小说”“新散文”登上文坛,但你和这些流派又不太一样,你一直在走自己的路,持续前行、实验,不断挑战。近些年从散文集《北京:城与年》到小说集《城与年》,再到《中关村笔记》《冯所在》,跨度很大,变化多端,感觉就像蹦极,而早期的《天·藏》《环形山》《三个三重奏》也跨度极大。你觉得这一切和你一上手就写“新散文”有关吗?特别是散文,本是一个静态的文体,你却使它奔跑起来,你觉得是西藏让你奔跑的吗?

宁肯:与其说奔跑不如说跳跃,一座山到另一座山。在西藏,每天一开门就是几千米的山,天际线很高,山与山看上去没什么联系,目光无法不跟着山峰的节奏跳跃,无意识里都是山的线条、节奏,以及谷底和三角面山峰相互映照的雪。我所在的学校操场都是倾斜的,一出宿舍门山就倾斜地压过来,半山的菩萨像白色的巨轮,又像白垩纪留下的冰川残片,每条小径都是迷宫,每个窗口都是经声。无数的出口事实上又是入口,你刚进去又出来,出来又进去了。按理说两年的时间并不长,但时时刻刻都如此会怎样?而且我那时年轻,正是定型时。我在北京南城小胡同长大,在青藏高原定型,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关系,但也许这关系回答了你的问题。

王德领:《天湖》和《藏歌》1986年问世,被认为是“新散文”的开山之作。新时期以降“朦胧诗”“先锋小说”“新散文”正好对应了诗歌、小说和散文,三者有什么联系吗?

宁肯:三者是同一块大陆隆起,一样的内部岩浆、地壳运动。20世纪80年代,西藏是文学重镇,出现了扎西达娃、马原、马丽华这样的人物,在文学、绘画、音乐领域都有一批先锋人物,边缘与中心,互为镜像,这在文学史上也不多见。所以说这可谓文学的地质运动,而西藏作为文学重镇无疑是一种隐喻。

王德领:2017年《北京:城与年》的空间从西藏转换到北京,增加了时间的维度,与一般回忆性散文不同,你站在现在对过去做了“考古学式”的发掘,现在与过去回环往复相互缠绕,是历史更是现实,散文在你这里,仿佛以前的规则和写法都不再有效。你给散文带来了许多异质的因素,你的散文始终以一种思考者的面目呈现,沉思不是冥想,理性话语的复杂缠绕,打开时间与空间的多个维度。你用西藏和北京这两个空间承载你的思考,充满了对原初的追问。你如何看待散文的探索?这些探索给你小说带来了什么质地?

宁肯:我的散文是西藏本身的镜像,无疑影响了我的小说,没有那批西藏的散文很难想象能产生《天·藏》。事实上,我有七篇散文直接放入了《天·藏》,读起来竟毫无违和感,跟小说很搭,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我的散文的不同,或者说“新散文”的不同、“新散文”本身和小说有着怎样的关系。同时,也回到了你的问题,我的散文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后来的写作,或更直接地说,西藏决定了我跳跃式的写作,你称之为“蹦极”。

王德领:在你的小说里追问与思考是一直在场的,是对日常生活进行审视的写法,致力于审视生活中变形扭曲的部分,书写中生成巨大的隐喻。诸如《蒙面之城》里紧张的父子关系,《环形山》中对两性欲望的形而上省思,《天·藏》中写到的虐恋,王学洁内心巨大的黑洞,《沉默之门》里的李慢遭遇巨大的外界刺激精神失常,小说版《城与年》中那个叙述人侏儒黑梦,垃圾场马戏团式的围观场景等。《冯所在》里的冯所在也是一个充满了象征的人物。你在小说里这样写的动力在哪里?小说是否可以看作对现实与历史的追问与思考?

宁肯:动力是有话要说但不能直说,这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艺术的要求:艺术不能直露,直露不叫艺术,不直露怎么办?诉诸隐喻。人有时就是这样:让你放开了写了你反而不会写了,有限制反而生成动力挑战,写的欲望反而特别强烈,于是生成了间接的东西、变形的东西、隐喻的东西,也就是艺术要求的东西。

隐喻就是复调,所谓现实也都是复调的现实

王德领:阅读你的小说让我想起了米兰·昆德拉。米兰·昆德拉认为,小说是勘探存在的诗性沉思,以提问对抗媚俗,以复调呈现复杂,拒绝给出答案,只揭示“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”。小说是对存在的探寻,存在不是已发生

宁肯,小说家,散文家,1959年生于北京。主要作品有《宁肯文集(八卷)》,包括长篇小说《天·藏》《蒙面之城》《三个三重奏》《环形山》,散文集《北京:城与年》《我的二十世纪》,非虚构作品《中关村笔记》,及长篇小说《沉默之门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城与年》《冯所在》



王德领,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,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发表诗歌散文若干,论文80余篇,出版专著《重读八十年代》《混血的生长》《存在与言说》等

的事实,而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。你的小说是对存在的揭示,而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描述,从存在出发向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探索。这从《蒙面之城》即已开始,引领马格离家出走闯荡世界的,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精神力量。到《天·藏》更是如此,小说里对此岸与彼岸、宗教与哲学的对话,是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探索,建构了宏阔的精神屋宇。

宁肯:一棵树旁同时存在着另一棵树,它们都有根。根在地下看不见,根存在但不可见,换句话说根是树的可能性,一棵树的根或者说现实的根是什么样的呢?小说的任务就是写出根,想象出根,创造出根,它仍有树的样子,但又不是树,它与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自成一体。

王德领:小说《城与年》虽然处理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生活,但对那个时代的生存场景,以及防空洞、火车、巨大光柱、冰雹等意象的反复叙述,产生了隐喻与象征的效果。这使你的小说超越了日常经验的层面,进入了人类精神的深处。我想问的是,你如何看待小说的精神深度?你的小说是典型的复调小说,多线索、多主题、多声部并存、相互对位。你对复调小说的理解是什么?

宁肯:隐喻可以解释为树的根,看起来写的是树,实际上写的是根,看起来写的是防空洞、探照灯、火车,实际上存在另外的火车、探照灯、防空洞。在我看来,隐喻就是复调,正如一棵树本来就是复调的树,所谓现实也都是复调的现实,因此你必须经常有一种意识,即小说意识。何为小说意识?现实即隐喻即为小说意识,当你总是看到现实的隐喻时,你的小说意识会非常强,复调意识也就很强。当然这是内在的复调,还有形式上的复调,这个就不多谈了。只补充一点,一个形式感强的地方一定是复调的,比如西藏,比如雅鲁藏布江,左岸是喜马拉雅山,右岸是冈底斯山,左岸是印度板块,右岸是欧亚板块,雅鲁藏布江是青藏高原隆起的两大板块的缝合线,这多有形式感,多么复调。《天·藏》中的注释我写时感觉就像雅鲁藏布江,是小说内部的缝合线。

王德领:我们谈谈小说的人物吧。你的小说里的人物,往往是现实秩序的反抗者,或者旁观者。而到了《冯所在》,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,冯所在是一个著名数学家,是积极入世者,对数学有着信仰般的虔诚。以前你的作品里的人物是人文知识分子,而《冯所在》里的主要人物几乎清一色是数学家,这是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。这个转变有些突然,你是怎么考虑的?

宁肯:我是非常偶然接触到数学家的,我发现数学、数学家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,很少人写过的视角。通过数学家的眼睛看世界、看历史、看文明,绝不是肤浅的噱头,而是大理石般的理性——数学文明的理性。数学家一如数学本身一样不在乎这个世界。

“跨界”可以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

王德领:在你的创作中,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向。2017年你完成了长篇非虚构作品《中关村笔记》。你在该书的序言里说,“快20年了,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,浸润得太深了,都湿透了,浑身都是敏感。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,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”。在中关村,你花了近

两年的时间调查、采访、写作,最后“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自己”。文学虚构需要现实的支撑,需要提供岩石般的底座。《中关村笔记》里写到了许多科技界的风云人物,有的人直接成为你后来小说创作的原型与素材,如著名数学家冯康、汉字激光照排发明人王选。那两年的田野调查工作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跳出文学看文学,这样的跨界写作的意义何在?

宁肯:我有过跳出文学的经历,有几年放下文学,同企业打交道,有时从外部视角看一眼文学,也就是从别人的眼光看一下文学,我惊讶地发现文学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小,类似你有了宇宙视角,比如在空间站上看地球,地球原来那么小,你几乎有一种怜惜的心情,而过去她是你全部的世界。我不知道这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,但有一点很明确,就是我更坚定走自己的道路,写作的荣誉、获奖、别人怎么看、名气对我没什么吸引力。到中关村调查,接触的都是非文学的人,柳传志、程维、吴甘沙……让我有许多年前跳出文学圈之外之感,写起来再次感到放松,就像当年写《蒙面之城》那样放松。放松是什么?就是有距离感,不再把文学看得那么近、那么重,不按套路写,不管当下文学什么样。我觉得这就是跨界的好处,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。

王德领:自改革开放以来,科技叙事在中国当代小说里是不多见的。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,文学所要表现的是正常的现实生活或者变形的现实生活,基本上很少正面触及科技本身。《冯所在》里的著名数学家冯所在,其原型就是《中关村笔记》里的冯康。小说里的王选,几乎就是现实版的王选。一般人都怕科学,如果不懂是真不懂,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?

宁肯:数学家也是人,是人就有文学的东西,就是文学所表现的东西,文学之外包括深奥的数学都是修辞,准不准确,真不真懂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将数学作为修辞表现人物、塑造人物,作为修辞学意义上的数学有效,修辞也就成立了。另外数学思想,数学怎么看世界,数学家怎么工作,这些并不难,你要是读些这方面的书会很容易理解,你理解了会给读者带来陌生的全然不同的东西。对传统的北京来说,中关村、数学、科技都是一种新的视角,一般人很少有机会通过文学这个视角看世界、看北京、看自我,其中别样的意义都是过去极少有的。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,也是第一生活,但我们只能通过科幻来认识它吗?

王德领:《冯所在》是《城与年》在空间上的进一步拓展。《城与年》的空间是在北京城南的胡同展开,而《冯所在》将空间延展至中关村,在中关村与胡同之间切换。中关村作为观察中国现代化的窗口,写了中关村就等于书写了现代中国。《冯所在》同样具有深邃的时间意识。小说不仅仅写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故事,还进行了中国文明史的钩沉,上溯至16世纪,以汤若望为纽带,连接起欧洲与中国,促成了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之间的交流。康熙虽然跟传教士学习了数学,还主持编写了数学书籍,但是囿于成见,却没有将数学在中国普及开来。这种对中国科技史的思考,使得小说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。另外,在那个特殊年代,科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,具有人性的深度,这就有了可以表现的丰富内涵。《冯所在》将这种科学背后的丰富性写出来了,写的是数学家的人与事,却具有难得的历史意识。

宁肯:我很早以前就有一个疑惑,20世

纪80年代的文化热、反思热,常常讨论封建社会那么长,为何没产生近代科学,然后说到康熙似乎是个例外,康熙懂西方数学、天文历法、测量,通过传教士老师学了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,可他这么懂数学,怎么我们的数学没发展起来?这次写《冯所在》我找到了答案。康熙学数学有一个特点,就是他只自己学,不让别人学,学了后常在出巡途中停下测量某个山峰,大臣们五体投地山呼万岁,康熙把数学当成了巫术。他所学的只是平面几何,莱布尼茨和牛顿当时已独立发明了微积分,而费马的数论、笛卡尔的解析几何、帕斯卡的摆线论都已诞生,传教士白晋向康熙提到这些,康熙也想掌握,但他无法理解代数用“字母”演算,至于那些数学符号更是无法认知,本来兴致勃勃的康熙勃然震怒,下了一道朱谕,“《代数新法》错处甚多,甲乘甲、乙乘乙,总无数目,算法平平尔”,禁止其传播。康熙不但没促使中国数学发展,还阻止了数学发展,让中国数学止于平面几何。数学是一种文明,通过写《冯所在》,我获得了一种文明的视角,这是收获之一。

王德领:《冯所在》虽然糅合了非虚构的成分,但是依然具有强烈的“宁肯特色”,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。诸如隐喻与象征无处不在,多视角叙事,过去与现在的交织与缠绕,浓厚的思辨色彩等。你下一步是否还会继续写科技题材作品?或者又准备“蹦极”到哪里?

宁肯:不会再“蹦极”了,《中关村笔记》《城与年》《冯所在》是一个组合,从2015年到2025年用了整整10年,还有那本非虚构的《北京:城与年》,也是这十年里完成的。两本非虚构两本虚构,都是关于北京的,“蹦极”已经蹦完了。为什么这样说?因为疆域已开拓出来,传统北京与非传统北京已在我的版图之中,北京已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北京,剩下的就是如何整合新老北京。在《城与年》与《冯所在》基础上,我现在在写一个叫做《普朗克时间》的“以自己为方法”的“新自传体小说”,整合新老北京,由兄弟两人叙述,其中一个有原型,另一个虚构,有别于传统自传体,摆脱了单一第一人称自叙,打开了虚构空间。就在前几天我在自媒体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:“写完《城与年》《冯所在》就开始彻底地写《普朗克时间》,六十岁写童年,两种时间,像遥远对开的火车,不同时空的同一条铁路,一样的火车,音乐响起,涤荡心扉!”有人煞有介事点评:“宁肯小说的语义方阵,就是量子叙事。”也不知什么叫量子叙事。

王德领:你的小说非常讲究写法,譬如你在《天·藏》中将注释作为第二文本的写法,在《城与年》中将现实与历史并置的记忆考古学的写法,而无所不在的隐喻与象征、渗透在文本中的反思色彩,小说的现代性在你的小说里是深入骨髓的。推动你小说形式探索的动力是什么?

宁肯:我年轻时定型在青藏高原,看惯了具有形式感的山和水,在我看来,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像西藏那样具有整体的形式感。形式即结构。结构有结构主义,当然也有解构主义,这是相辅相成的。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做过一次讲座,题目就叫作《西藏地理特征与小说叙事结构》,讲了西藏与结构主义,主要观点便是:在西藏,你无法不结构主义。

